

西摩·马丁·利普塞特

再论民主制度的社会先决条件

1994年2月

第十七届年度西摩·马丁·利普塞特全球民主讲座



2020年12月3日

John Mark Lijphart

再论民主制度的社会先决条件

《美国社会学评论》第59期第1卷(1994年2月):页1-22

—+—

获美国社会学学会授权翻印

再论民主制度的社会先决条件*

1993年 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致辞

西摩·马丁·利普塞特
乔治梅森大学

本文探讨影响全球民主制度化前景的因素和过程。笔者考察了文化和经济变量、宗教传统、各类选举制度、参与型公民社会的重要性，以及政治党派的组织架构应如何设计以便保持稳定。本文的结论是：由于新兴民主国家的合法性较低，对于其能否长治久安，人们应持谨慎态度。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期，许多国家政治民主化的开端伴随着影响深远的经济危机。为了获得合法性，新兴民主国家最需要的是做到有效(efficacy)，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但也包括政治领域。这些国家如果能在经济建设中取得成效，便能相应地保持政治稳定。反过来说也一样：满足不了最基本供需的政府是无法发展的，也无法让真正的民主制度生根发芽。

最近民主的扩张，即塞缪尔·亨廷顿(Huntington 1991)所说的“第三浪潮”，始于1970年代中期的南欧。随后，在1980年代的早期和中期，这种扩张延伸至拉丁美洲和亚洲国家，例如韩国、泰国和菲律宾；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民主抵达东欧、前苏联和一些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不久之前，绝大多数联合国成员国都采用威权体制。但到了1993

年年底，超过一半的联合国成员国，即186个国家中的107个，都已建立竞争性的选举制度，并对政治与个人权益提供各式各样的保障——这是1970年的数字的两倍(Karatnycky 1994:6; *Freedom Review* 1993:3-4, 10)。民主最薄弱的是在伊斯兰国家(稍后我会探讨为何很少有伊斯兰民主

国家)和一些非洲国家。而尽管尚未完全实现民主，“已有超过30个非洲国家正处于从文职官员或军政府统治的威权体制转变为更多元的体制的过程中”(Schneidman 1992: 1; Diamond 1992b: 38-39; Diamond, 1993b:3-4)。民主转型的过程并不简单。那些曾经历过威权体制的国家可能难以建立一个具有合法性的民主体制，原因是这些国家的传统和信仰可

*给西摩·马丁·利普塞特的信件请寄到以下地址：Seymour Martin Lipset, 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y, Pohick Module,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Fairfax, VA, 22030。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和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对本文提供了帮助。本文包含并扩充了笔者在过去30年里对民主的社会先决条件的研究(Lipset [1960] 1981; Lipset, Seong, and Torres 1993)。感谢克里斯·温特斯(Chris Winters)和斯科特·比令斯利(Scott Billingsley)在研究上提供的帮助，感谢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提供的学术建议。本文早前的版本曾于1992年11月在斯坦·罗坎纪念讲座上报告。

能不符合民主的内涵。

在其经典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中,约瑟夫·熊彼特(Schumpeter 1950)对“民主”作出如下定义:“这是一个制度上的安排,使个人通过竞争得到民众投票而获取做决定的权力”(页250)。¹这个定义过于宽泛,我在本文中的探讨不可能对其作出全面考量。²本文将专注于文化和经济变量、对选举制度的讨论、宪制安排(例如总统和议会间的关系)、参与型公民社会的重要性,以及政治党派应该如何设置以促进和保持稳定。简而言之,本文着眼于影响民主制度建设的因素和过程。

民主是如何兴起的?

贫穷国家的政治

在探讨民主前,我先要表明我的倾向和设想。我赞同美国开国元勋的一些基本关切——强大的一国政府应令人感到恐惧(或借用法律界的术语:应令人感到怀疑),必须要找到方法去制衡它。正如经济学家已经证明的,在当代这一点在低收入国家尤其明显。有一个概念叫“库兹涅茨曲线”(Kuznets curve)(Kuznets 1955; 1963; 1976),尽管仍有争议,但它显示出一个欠发达国家在发展和城市化之初,其收入分配状况会出现恶化,但随着工业化程度提

1. 详见 Lipset (1981:27); Dahl (1970:78; 1971:150-62; 1982:11); Huntington (1991 5-13); and Schmitter and Karl (1993:40-46)。

2. 有关定义本身如何影响对民主的分析,参见 Sartori (1983:28-34; 1987:257-77)。

高,其收入分配会渐趋平等(Olson 1963; Weede and Tiefenbach 1981; Todaro 1981:134; Bollen and Jackman 1985b; Muller 1988; Chan 1989; Weede 1993)。³在一个国家开始发展之前,社会阶层的收入结构呈现狭长的金字塔型,即底层最为庞大,到了中部和顶部时逐渐变窄(Lipset 1981:51)。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往往是最重要的资本、收入、权力和地位的来源。这一点在国家主义(statist)的制度下尤其突出,但它同时也出现在很多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系中。一个人或一个政府愿意因为一次选举结果而交出权力是惊人之举,这不正常,表面上看来也“不理性”,特别是在一些新兴的、缺乏稳定与合法性的国家里。

马克思(Marx)多次指出极度的不平等是与匮乏相连的,所以他相信社会主义——他认为这是一个有着平等和民主,并且政治上弱小的制度(a politically weak state)——只能在物质丰富的条件下产生(Marx 1958:8-9)。强行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追求社会主义将导致社会发展中断和被压制。共产主义者证明了马克思观点的正确性。研究民主的巴西学者弗朗西斯科·维弗特(Weffort 1992)坚信,“尽管公民的政治平等……在某些(经济上)高度不平等的国家也可以存在,”但是这种反差“可能导致社会矛盾、制度扭曲、不稳定和反复的暴力冲突……(也可能导致)民主无法得到巩固”(页22)。一些当代的社会科学家发现,较高的富裕程度和福祉与民主体制的存在是相辅相成的(Lip-

3. 这些概括不适用于韩国、台湾和新加坡这些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

set, Seong, and Torres 1993:156-58; 另见 Diamond 1992a)。除了国家财富和经济阶层分化的影响之外,当代的社会学家也认同托克维尔(Tocqueville)的观点,那就是社会平等对民主大有裨益,即身份的平等和对个体的普遍尊重,无论财富多寡(Tocqueville 1976: vol. 2, 162-216; Lipset 1981:439-50; Dahl 1971 :85-104; Sartori 1987:343-345; Dogan 1988: 11-12)。但正如维弗特强调的(Weffort 1992),“很多新兴民主国家并没有达到这种‘最低的’社会条件前提……(这能够)帮助我们解释为何这些国家会陷于典型的民主不稳定”(页18)。

经济和政体

在19世纪,很多政治理论家注意到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之间的联系(Lipset 1992:2)。正如罗纳德·格拉斯曼(Glassman 1991)指出的,“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古典资本主义经济学家,甚至是拥护君主制的人士,都认同工业资本主义和议会民主之间的联系”(页65)。这样的经济制度,包括一批数量庞大的、独立的农民阶层,催生出一个中产阶级,这一阶级能够与国家抗衡,并提供资源帮助独立社群,包括马克斯·韦伯(Weber 1906:346 ff)、约瑟夫·熊彼特(Schumpeter 1950)、巴林顿·摩尔(Moore 1966)、西达·斯考切波(Skocpol 1979)和彼得·柏格(Berger 1986; 1992)等人在内的20世纪的学者也得出同样的结论。熊彼特(Schumpeter 1950)认为,“现代民主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页297)。摩尔(Moore 1966)

则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一样,认为“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页418)。

柏格(Berger 1992)从保守主义的立场提出,尽管“政治民主的国家必然是市场经济……但也有不少例子证明非民主国家也在实行市场经济”(页9)。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是产生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Diamond 1993a)。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Diamond, Linz, and Lipset 1988:xxi),“(从市场经济的体量和企业家阶层的独立性而言)那些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程度的”民主国家,“也是受到最多压力去实现民主的国家”。

在探讨为何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国家仍未能实现民主时,学者卡洛斯·魏斯曼(Waisman 1992:140-55)提出,这些国家生产资料的私有程度仍不足以推动民主。魏斯曼称,一个强大的市场经济是民主的必要前提。当国家限制市场并推动国家经济自给时(即限制竞争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就会导致威权主义。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需要民主,民主也需要自由的市场经济。

而尽管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中产阶级的壮大削弱了国家的权力并促进了人权和法治,但要求扩大投票权和党派权利的却是工人阶级,尤其是在西方(Therborn 1977; Rueschemeyer, Stephens, and Stephens 1992:59, 97-98, 140-43)。⁴正如约翰·史蒂文斯(Stephens 1993)指出的,“资本主义的发展

4. 当然,最近几年在东亚、拉美和那些南欧后裔的国家都能看到这一理论的证据。

与民主的兴起相关,部分原因在于资本主义与阶级结构的改变相关,这种改变强化了工人阶级”(页438)。

腐败作为治理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与建立在贫困之上的制度相辅相成的(Klitgaard 1991:86-98)。国家必须分配其控制的资源,例如工作、合同和投资资本。当国家处于贫困中时,它就会强调排他主义或个人色彩。显然,这种情况下要清除与国家所控制和影响的资源相关的“裙带关系”是不可能的。人们渴望制定法律和规范来减少裙带关系,公正地将个人能力作为衡量标准,但现在的富裕国家经过漫长的时间才将这些规则制度化,而且这些规则往往不符合欠发达国家的传统及其人民的需要。因此,正如杰弗逊(Jefferson)和麦迪逊(Madison)等人在18世纪末指出的,国家干预越少越好;国家直接控制的资源越少,实现自由政体的可能性越大。

因此,可以说竞争性的市场经济是从社会和政治角度消除裙带关系影响的最佳方式。市场的力量越大,拥有国家权力和资源的政治精英进行权力寻租的空间就越小。除了限制国家的权力外,新兴和贫穷的民主政权还应该强化道德操守。在进行援助、贷款和其他非国家资源的分配时,应执行明确而客观的标准。当然,这要由一个以任人唯贤的标准选拔出来的公务员队伍来实现。英国、美国和欧洲多国公务员制度的改革历经了几十年的时间才完成(Johnston 1991:53-56)。改变当今贫穷国家的习惯和规则并非易事,不过韩

国似乎在短时间内一枝独秀地做到了这一点(Seung-Soo 1992; Macdonald 1992)。

政治文化的中心性

民主需要文化的支持,即全体公民和政治精英对言论自由、媒体自由、集会自由、宗教自由、反对党的权利、法治、人权等原则的接纳((Almond 1956:34-42; Pye 1965:3-26; Dahl 1971:1-16; Bobbio 1987:63-78; Diamond, Linz, and Lipset, 1990:16-18)。这种规范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形成。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到1917年的俄国二月革命,从19世纪拉丁美洲新建立的大部分国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非洲和亚洲国家,它们从威权主义过渡到民主的多番努力都宣告失败。林兹(Linz 1988)和亨廷顿(Huntington 1991)指出,此前两次民主化浪潮之后都出现了威权主义的复兴。“在1915年至1931年间采纳民主体制的17个国家中,只有4个能在1920年代至1930年代维持民主……32个在1958年实行民主的国家里,有三分之一到1970年代中期已转变为威权政体”(Huntington 1991:17-21)。

这些前车之鉴对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拉丁美洲和非洲当下的民主转型并无好的预示。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最新报告指出:“在1993年行将结束之时,全球的自由度正在下滑,而暴力、压迫和国家控制则呈上升趋势。这是5年以来首次出现这种情况……”(Karatnycky 1994:4)。这样一种正在形成的“逆潮”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尤为明显,当地

“有9个国家有所进步,而18个国家则出现倒退”(页6)。在俄罗斯,一个有着法西斯倾向的组织领先其他党派,在1993年12月的大选中获得了24%的选票,与此同时,共产党及其盟友获得了逾15%的选票。

在绝大部分民主制度开始萌芽的地方,其过程都是渐进的,反对势力和个人权利在政治的博弈中萌发(Sklar 1987:714)。正如近40年前,我与我当时的学生马丁·特罗(Martin Trow)和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写下的:

社会中的民主权利大多是通过各类组织——阶级、宗教、利益、经济和专业团体等——之间的博弈和它们与政府的抗争得来的。每个利益集团都希望达成其意愿,但如果没有任何一个团体强大到能获得绝对的权力,其结果就是互相宽容。总体而言,宽容这一概念的产生以及对持有不同意见并互相争夺追随者和权力的政治团体的权利的认可,都是来源于各个社会里强大而牢不可破的团体之间的互相较量。以下几个过程使宽容这一概念收获认可:某些情况下,一些团体,例如天主教和新教教会曾尝试击溃对方,但他们最终认识到绝对的胜利是不可能实现的,即使真的实现了也可能导致社会的分崩离析。在这样的较量中,弱势群体和反对势力发展出一种民主的意识形态,坚持主张维护弱势群体的某些权利,并以此为他们自身的存在正名。这些群体还可能迫使当权者给予他们这些权利以避免革命暴动或权力更替。对于这些群体而言,停止坚持自身权利可能意味着丧失众多追随者的支持,而这些追随者已成为民主价值的拥护者(Lipset, Trow, and Coleman 1956:15-16)。

因此,民主得以渐进地发展,首

先发展出的是以财产或受教育水平为基础的投票权。政治精英逐渐允许大众参与投票,容许并将反对派的权利制度化(Almond and Verba 1963:7-8; Rustow 1970:357)。正如罗伯特·达尔(Dahl 1971:36-37)曾指出的,19世纪欧洲的一些政党,例如自由党(Liberals)和保守党(Conservatives),其建党的初衷并非要赢得多数选民的支持,而是要保障其在议会中的多数席位。这些政党并不热衷于煽动民粹主义。

比较政治学指出,权力、地位和财富越是集中在国家手里,民主制度的建立就会越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斗争容易着重于零和博弈(a zero-sum game),失败的一方将一无所有。中央政府越是有威信和优势,当权者和反对派就越不愿接受将党派斗争制度化并有可能导致权力更迭的游戏规则。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当政治和经济之间的纠缠有限时,民主就最容易产生——比如在早期的美国,还有其他西方国家。在北欧,民主化容许王室和贵族保留他们的身份,尽管他们的权力被削弱。在美国,中央政府在半个多世纪里都不是特权的主要占有者,因此当权者容易让出权力。

民主在任何地方都不曾按照计划发展,除了由实行民主制的战胜国推行民主的情况,比如二战后的德国和日本所经历的。从美国到北欧,自由、投票权和法治都是以零散的方式而不是有计划地发展的。为了令其自身合法,执政者即使不情愿也会最终认可反对派存在和自由竞争的权利。几乎所有新兴民主国家的领袖,如

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和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都曾尝试过镇压反对者。如前所述,历史上多数新兴民主国家都很快被推翻,例如1871年之前的法国,1848年前的欧洲多国,一战后的东欧、中欧和南欧,以及反复出现这种情况的拉丁美洲和非洲。民主的成功所反映出的少数派政治团体的实力和运气,甚至多过于新当权者对民主制度的承诺。

跨民族的历史学研究发现,文化因素可能比经济因素对民主有更大的影响(Lipset et al. 1993:168-70; 另见 Huntington 1991 :298-311)。罗伯特·达尔(Dahl 1970:6)、乔治·凯南(Kennan 1977:41-43)和伯纳德·刘易斯(Lewis 1993:93-94)强调,19世纪全球第一批民主国家(大约20个)主要是西北欧国家及其国民移居的国家。“还没有证据显示在这些有限的族群以外的人会选择这种治理模式”(Kennan 1977:41-43)。作为研究中东地区的权威,刘易斯(Lewis 1993)认同凯南的上述观点:“(民主)制度尚未从其他文化传统中发源;这种制度是否能移植和适应其他文化并长期生存也是有待观察的”(页93-94)。

还有一点尤其特别:最新关于政治体制与哪些变量相关的统计分析显示,曾经被英国殖民是与民主关系最紧密的变量(Lipset et al. 1993:168)。正如麦隆·韦纳(Weiner 1987)指出,除了19世纪的美洲和澳大拉西亚(Australasia)以外,“在所有至少有一百万人口的国家里(以及几乎所有更

小的国家),已脱离殖民统治并且能延续民主制度的,无一例外都曾曾是英国的殖民地”(页20)。这其中复杂的原因(Smith 1978)。对比英国殖民地和非英国殖民地会发现,很多前英国殖民地(例如革命前的北美洲以及近期的印度和尼日利亚)在独立前就已经建立起选举制度、政党和法治。相反,那些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荷兰和比利时的殖民地,以及前苏联国家,它们并没有允许“异见团体”(“out groups”)逐渐加入主流政体。因此,民主化在前英国殖民地比世界上其他地方来得更循序渐进,也更成功;这些国家独立前的经历起到了重要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作用,帮助它们更顺利地向自由转型。

宗教传统

宗教传统是一个国家能否向民主转型的重要因素(Huntington 1993:25-29)。从历史上而言,罗马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和儒教都与民主有着负面的关系;相反,基督新教和民主则是相辅相成的。这些差异有以下几个解释:(1)新教更强调个人主义;(2)其他四个宗教传统上与政权的关系更紧密。亚历西斯·托克维尔(Tocqueville 1975)和詹姆斯·布莱斯(Bryce 1901)曾指出,宗教和政治信仰的分离能促进民主发展,从而让政府无须听命于教会的戒律。

从托克维尔时代到1970年代中期的学者都曾注意到,在所有欧洲国家及其海外领土里,信奉新教的国家比信奉天主教的国家更容易建立民主政权(Lipset 1981:57-

58; Lipset [1970]1988:90; Bollen 1979:83; Huntington 1991:79-82。皮埃尔·特鲁多(Pierre Trudeau 1960)在1950年代末期作为一名政治学者观察得出,天主教一直以来都与政府关系密切,天主教会等级分明,“在宗教信仰方面是威权的,而由于信仰和世俗的界限往往模糊不清,天主教会为解决世俗问题时也不愿采用表决的方式”(页245)。而新教徒,尤其是来自与世俗政权无关的派系的新教徒,相对缺少威权色彩,地方性更强,更具参与性,并更强调个人主义。但天主教国家在1970和1980年代为世界的第三次民主浪潮作出了重大贡献,反映出“在1960和1970年代.....天主教会在其信条、传播、社会和政治承诺方面出现的重大变化”(Huntington 1991:281, 77-85)。这些变化主要来自以下因素:所谓的极右主义和教权法西斯主义在天主教思想和政治体系中合法性的丧失,欧洲法西斯主义的溃败,以及二战后几十年里多个主要的天主教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例如在意大利、西班牙、魁北克、巴西和智利。

相反的是,穆斯林国家(尤其是阿拉伯世界)并未参与世界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它们几乎都仍是威权国家。这些国家在近期仍不大可能发展民主,因为“政治自由的概念并不广泛为人接受.....它们与伊斯兰格格不入”(Vatikiotis 1988:118)。正如罗宾·怀特(Wright 1992)指出的,伊斯兰教“提供的不仅是一套精神信仰,还有一套社会治理的规则”(页133)。厄内斯特·盖尔纳(Gellner 1991)指出,“现代世界的穆斯林社会几乎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的缩影,被

信仰包围着,甚至可以说是被过多的信仰折磨着.....”(页506)。刘易斯(Lewis 1993)在分析过去和现在穆斯林信仰与政体的关系时写道:

伊斯兰国家从原则上而言是神权国家(theocracy)——并非西方意义上的由教会和神职人员统治的国家.....而是按照字面意思、由神来统治的政体.....原则上而言,其国家是神的领土,所统治的是神的子民;其法律也是神的法律.....

伊斯兰国家的历史是一部从未被解放的极权史.....这毫不令人意外(页96, 98)。

阿里·卡赞西吉(Kazancigil 1991)对穆斯林和东正教国家在民主方面的弱点给出了同样的解释,他认为两者都没能做到“政教分离”(页345)。在东欧,特别是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将其与世俗政权的关系建设得十分密切。正如格里高利·古洛夫和亚历山大·古洛夫(Guroff and Guroff 1993)所强调的:“教会一直以来都是俄罗斯政权的一个机关,在沙皇和苏联统治下都是如此.....无论是在沙俄还是苏联,东正教教会都未曾积极为人权或宗教宽容发声”(页10-11)。

什穆埃尔·艾森施塔特(Eisenstadt 1968)指出,在儒家中国“没有任何教会或文化组织.....能独立于国家存在”(页25),同样,“伊斯兰教强调宗教和政治社群之间的身份”。艾森施塔特由此总结道,“中国和伊斯兰社会之间有重大相似之处”(页27)。亨廷顿(Huntington 1993)指出,“传统儒教是非民主的或反民主的,这一观点还没有任何学者提出过异

议”(页15;另见Whyte 1992:60)。白鲁恂(Lucian Pye 1968;另见Pye with Pye 1985)也指出儒教和共产主义理念之间的相似之处:“两者在当权者的傲慢上同样极端……都坚持官僚的垄断……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儒教和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上都明确强调权威和秩序”(Pye 1968:16)。何包钢(He Baogang 1992)的看法虽然不那么悲观,但他在分析中国大陆的文化传统后得出:“证据显示,目前这里反民主的文化比亲民主的要更强大”(页134)。只有日本这个儒家色彩最浅的国家“在1990年以前已有持续的民主……而其民主是美国占领的产物”(Huntington 1991:15)。其他包括韩国、越南、新加坡和台湾等地以往都是独裁的。与其他缺少民主的文化类似,“儒教将社会和国家合二为一,没有对自发的社会组织提供国家层面的合法性”(页301)。当然,这种情况在最近几年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已经出现变化,这反映出经济的变化能如何影响政治体制,削弱威权主义。

但是印度这个在工业化之前已成为民主政体的印度教(Hindu)国家则与众不同:

就我们讨论的问题而言,印度文明最突出的特征是:它大约是历史上唯一一个能够保持其文化身份、不受某个政治框架限制的高度完整而独特的文明。与历史上的其他帝国文明相比,印度政治更倾向于以世俗的形式产生……因为印度的文化和政治相对分离,现代化的发展可以不受传统文化倾向对政治影响的禁锢(Eisenstadt 1968:32)。

这些对文化的归纳总结并没有给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的前共

产主义国家带来光明的预兆。天主教教会在波兰脱离苏联共产主义的控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如前所述,历史上笃信天主教的地方并不容易接纳民主观念。尽管天主教会放松了对西欧和大部分美洲国家的控制,但正在加强对东欧政治的干预,由此引发的冲突令波兰受害。东正教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处于支配地位。乌克兰则被天主教和东正教这两者控制。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很强大。穆斯林在前苏联的中亚地区人数众多,在一些地方占到多数——而这些地方一直以来是前苏联成员国中最缺乏民主的。以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为主、加上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和信奉伊斯兰教的波斯尼亚人组成的前南斯拉夫,现在正深陷民族和宗教矛盾之中,没有和平,更没有民主的希望。如果我们对一系列文化价值及其相关制度所带来的、持续的失调现象熟视无睹,那么这就是在自我欺骗。

但人的信仰是会变化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壮大、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财富的增长、教育的提升都与世俗主义和公民社会的成熟息息相关,而世俗主义和公民社会能帮助政教分离,并帮助达成民主的其他先决条件。近几年里,在这一点上最为明显的莫过于经济腾飞的东亚儒教国家——这些国家曾经被认为几乎没有可能实现发展和民主。杜维明(Tu 1993)指出,它们“在民主化和市场化方面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新加坡、韩国和台湾都在1992年成功举行了全国大选,明

确显示出民主在儒教国家不仅可能而且可行”(页viii)。黎安友和史天健(Nathan and Shi 1993)在“中国首个科学有效的全国性政治行为和态度的调查”中写道:“与其他稳定和传统悠久的民主国家的居民相比,中国人在我们关注的变量上得分较低,但并没有低到令人得出中国无法实行民主这种结论的程度”(页116)。在俄罗斯进行的调查也得出相似的、积极的结论(Gibson and Duch 1993),但从种族民族主义者和亲共主义者可以看出,俄罗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民主在前苏联的大部分国家都还没能生根发芽,在工业化程度较低的穆斯林国家和许多非洲国家也是如此。新兴民主国家也有很多未竟事宜;必要的文化转型显然还没有完全实现,因此我们还不能说“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不会被扭转。根据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一份报告,1993年“在自由(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方面出现退步的有42个国家,进步的有19个国家”(Karatnycky 1994:5)。⁵

制度化

新兴民主国家必须制度化和巩固其民主,并变得具有合法性。这些国家都面临很多问题,包括建立一个更繁荣、平等的经济体系;减少与旧时代的社会和军方精英的冲突,或者干脆取代他们;并且以稳定的政党为基础建立可行的民主选举和治理体系(Linz and Stepan 1989; Whitehead 1989; Di

5. 在自由之家的调查中,一个国家可能在衡量自由的排名中上升或下降,但其民主和威权的性质不一定发生变化。

Palma 1990:44-108; Huntington 1991:208-79)。想要涵盖所有关于民主制度化的问题,须专门著书立说,所以我在这里只探讨以下几点:合法性、行政和选举体系、公民社会和政治党派,以及法治和经济秩序。

合法性

民主制度的政治稳定不能依靠武力。在武力之外的选择是寻求合法性(legitimacy),即一种为各方所接受的、系统性的“统治权”(“title to rule”)。⁶例如,大部分北欧和英联邦国家都在发展民主体制的同时保留了由君主制的延续而得来的传统合法性。如果没有这种制度和传统,民主可能不会像现在这样发展,甚至可能根本不会建立。

合法性理论的鼻祖马克斯·韦伯(Weber 1946)提出了当权者获得合法性的三种方式,大致概括如下:

(1) 传统型(Traditional)——“一贯”掌握权力,最佳的例子就是君主制社会的统治权。

(2) 法理型(Rational-legal):权力获得服从是因为当权者通过广为接受的统治制度赢得职权。例如,在美国,宪法是所有权力的基础。

(3) 感召型(Charismatic):权力基础来自人们对领导人拥有强大个人价值的信任。这种个人价值可能来自于神,如宗教先知;也可能来自于领导人所展示出的过人天

6. 有关合法性问题的近期研究,参见马太·杜甘(Dogan 1988)。另见利普塞特(Lipset [1963]1979:17)。

赋。很多当权者的“个人崇拜”都说明了这一点(页78-79)。

获得合法性的最佳方式是通过长期的有效性(prolonged effectiveness),即政府实际上的表现以及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多数民众和重要权力集团(如军方和商界领袖)的基本需求(Lipset [1960]1981:64-70; Lipset 1979: 16-23; Linz 1978: 67-74; Linz 1988:79-85; Diamond et al. 1990:9-16)。然而,上述概括对新兴民主体系并无帮助,因为目前对它们而言,在制度方面最有用的建议是将权力的基础和权力的代理人切割开。

这种切割的重要性绝不可低估。权力的代理人可能受到选民的强烈反对,可能被选民换下去,但权力的内核与象征必须受到尊重并不被挑战。因此,公民需要遵守法律和规则,即使他们不喜欢执法的人。以上情况曾经发生在后佛朗哥(post-Franco)时代的西班牙,当时西班牙成功并有效地恢复了君主制,但今天很少有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在二战后因为麦克阿瑟的原因,日本在天皇的支持下发生了重大转变,从而避免了一战后协约国犯下的错误。在一战后,协约国摧毁了德国的君主制,支持后来的魏玛共和国。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曾强烈反对此举,他正确地预计到新建立的民主制度会被德国王室的旧势力所反对,不会得到他们的拥护。

在多数新兴的民主体系中,法理型合法性都是孱弱的,因为在这些国家的历史上,法律曾经为外

来殖民者或本土独裁者服务。建立法理型合法性需要加强法治和法庭的威信,这二者必须在最大程度上独立于政治之外。正如布鲁斯·阿克曼(Ackerman 1992:60-62)和巴里·温加斯特(Weingast 1993)指出的,在新兴民主国家里,这些要求意味着必须尽快出台一部“进步的”宪法(a “liberal” constitution)。宪法能提供合法性,限制国家权力,并提供政治和经济权利的基础。当然,要建立稳定的合法性需要时间。

前法西斯国家在战后建立的民主政权,如魏玛共和国,是在占领国的支持下建立的,因此一开始并无合法性可言。但战后的“经济奇迹”创造了就业,并使生活水平持续提升,让这些政权有了优势。这些民主体系的稳定也与反民主的右翼倾向失去人心有关——反民主的右翼势力被与法西斯主义和军事上的失败联系在一起。

我在此重申,欠缺合法性的民主政权如果想要生存下去,必须做到有效(effective),或者像一些拉丁美洲和前共产主义国家建立的民主政权一样,获得负面合法性(negative legitimacy)——因为以前的独裁政权的邪恶,新政权能够消除威权主义就获得了合法性。通过革命、政变或在威权政权倒台后新建立的独立国家,往往从根本上缺乏合法性。因此,在一战之后的欧洲,推翻奥匈帝国、德国和沙皇俄国所建立的民主国家大部分都没能长治久安。在1920年,28个欧洲国家中有26个是代议制民主;但到了1938年就只剩下12个仍是自由国家(Mann 1993:2; Lee 1987)。如前所述,二

战后拉美和非洲国家的民主也很孱弱,而到了最近的1993年,许多新兴民主国家都出现了政治权利的重大倒退。除了经济上的失败以外,这些政权难以满足其国内各个跨民族的参照群体(reference groups)和革命政党的要求,也缺乏足够的资源来获得民众和精英的支持,因此它们建立民主的努力不断失败(Linz and Stepan 1978)。

尽管这种假设很难满足,但如果各方面条件相同,非民主的威权政权要比民主政权更脆弱。从其本质而言,威权政权合法性较弱;更依赖于武力而非信念来维持权力。因此,可以说威权制度容易被大部分民众反对甚至抵制。如果一种政治制度缺乏合法性,它就会引起更多民怨,更腐败,并出现更多对规则的破坏。一个依赖于武力来维系、并不受民众认可的政权,从本质上而言是不稳定的,更可能在危机面前崩溃。正如托克维尔(Tocqueville)所言,即使是快速的经济增长也不能维持这样的政权。特别是在民主扩散的时代,专制政权处于进退两难的处境:如果这些政权像佛朗哥时代的西班牙或者韩国和智利一样,“能达成社会经济的进步,它们就容易将大众的愿望重新聚焦在政治参与和发声的诉求上,而这又是它们无法满足的,除非结束其独裁统治”(Diamond 1989 a:150; Huntington 1968:5, 41)。反之,如果专制政权未能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取得成功,它们合法性的缺失就会致其垮台。

但苏联的历史似乎与上述情况不符,因为该政权维系了长达四分

之三个世纪。然而,一个脆弱而不受欢迎的政权也不一定要倒台。因为压迫性的警察权力、强大的军队和统治者运用残暴武力的决心是可能长期维系一个政权的。这种体制的瓦解可能需要一个重大的催化事件,比如一场战争的失败,经济的极速下滑,或者是政治精英的内讧。在苏联,戈尔巴乔夫(Gorbachev)上台之前已经有各种各样的经济和社会数据表明该国所面对的巨大困境——例如生产力的下降和死亡率的上升都显示出其制度的严重失灵;而其规模庞大的秘密警察组织也证明了政权合法性的低下(Feshbach 1978, 1982, 1983; Amalrik 1970; Todd 1979)。在1953年的东柏林、1956年的布达佩斯、1968年的布拉格和1955年后的波兰发生的一系列抗议事件,都有可能并最终确实在莫斯科重演。现在我们都知悉,苏联最激烈的批评者是对的。尽管苏联直到最近才在政治上垮台,但其制度在此前已导致其经济极度缺乏效率,生产力也相对不足。

与专制政权相反,民主体制依赖和寻求民众的支持,并长期为此竞争。政府低效也不一定影响其他社会和经济领域。反对派实际上起到沟通的作用,着眼于揭露社会和政府存在的问题。异议的自由帮助经济和政治相关信息的流通。

韦伯(Weber 1946:232-34)曾指出,一个独裁者往往没有民主社会的领导人权力大。韦伯认为,由于信息的不自由,独裁者未必会知道其指令是否会被官僚机构或反对派利益集团所无视。韦

伯引用了普鲁士帝国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失败的土地改革作为例子。当时的普鲁士官僚机构和与拥有土地的贵族关系紧密的地方政府违背了新法,但却无人告知腓特烈大帝。如果是在一个民主国家,反对派和媒体通常都会揭露这种违法乱纪之事。

戈尔巴乔夫在其执政的前几年中,至少有两次在讲话中谈到一党制的不良后果。与韦伯的观点类似,戈尔巴乔夫也指出官僚机构对其反对的命令和改革不作为。他说,这样的事在多党制度下不会发生。戈尔巴乔夫当然不可能呼吁多党制,但他呼吁苏联的媒体和知识分子承担起在民主社会中由反对派扮演的沟通和揭露的角色(Gorbachev 1987:R24; 1988:33)。

非传统的威权主义政权尝试通过个人崇拜(cults of personality)来建立合法性(比如拿破仑、杜桑·卢维杜尔、波费里奥·迪亚斯、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新兴的独裁政权往往缺乏通过法治建立法理型合法性的途径。尽管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明确反对渲染“强人”(great men)在历史中的重要性,并强调物质和“人民大众”(the people)的作用,但共产主义政府却不得不依靠统治者的个人魅力来建立感召型合法性。它们的举措缔造了例如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铁托、卡斯特罗、胡志明、金日成等个人崇拜。值得指出的是,历史上有4个共产主义政权经历过大规模的反抗,它们是:1953年的东德、1956年的匈牙利,1955年至1980年的波兰,以及1968年的捷

克斯洛伐克。这些国家都是个人崇拜色彩最弱的,正如1989年至1991年的苏联。

但是感召型合法性从本质上而言是不稳定的。如前所述,最佳的政治制度是将权力的基础和权力的代理人切割开的制度。当掌权者及其政策被视作压迫性或剥削性时,该政权及其统治就会遭到反对。人民不再认为自己有义务去遵守规则或诚实行事;仅凭武力是不可能取得合法统治权的。

行政和选举制度

民主的优势不仅是道义上的,它最终也能促进系统性的稳定。在民主社会,公民认为政体包含社会各个群体,而不仅仅是当权者。选民是构筑合法性的一部分。拥有最高权力的是选民而非政府。选民被鼓励为改变政府而努力,同时忠于民主体制。不过,在低收入国家建立制度保障自由的努力面临严重困难,因为新的民主权利促使人们提出诉求并付诸行动,这本身会影响到经济的稳定。

加拿大社会学家梅塔·斯宾塞(Spencer 1991)强调,“保护少数群体的权利不受多数人侵犯”是同样重要的。当少数群体(特别是拥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和宗教的少数群体)感到他们不能分享权力(例如在选票上永远占劣势的时候),而同时又在自己的地区占多数时,他们就on能尝试实现地区自治或分离出去,以此将自己从文化上的少数群体变为多数群体。这种情况曾经发生在前南斯拉夫和前苏联的部分地区(页427)。在那些认为自己被排除在权力之外的少

数群体看来,民主是缺乏合法性的。因此,民主转型往往会影响多文化政体的稳定,就像在许多前共产主义国家出现的情况一样。约翰·卡尔霍恩(Calhoun 1947)在19世纪初提出的并存多数理论(concurrent majority)和当代学者阿伦·利帕特(Lijphart 1977)提出的协商联合制度(consociational systems)对这个问题提出了相似的解决方案。这些学者提出在宪法架构中给予少数群体在影响其利益的政策制定方面的一票否决权。这种尝试在塞浦路斯和黎巴嫩失败了,但在瑞士却似乎获得成功。加拿大和南非正在研究类似的政策。拉妮·古尼尔(Guinier 1993:1589-1642,特别是1625-42)提出与卡尔霍恩相似的改革方案;而讽刺的是,卡尔霍恩的方案旨在保障蓄奴者的权益,而古尼尔则旨在保障奴隶及其后代的权益。

当然,对于解决民族矛盾和其他群体之间的矛盾并划定区域政治的版图而言,联邦主义(Federalism)是最古老的、也是在很多方面最有效的方法。正如唐纳德·霍洛维茨(Horowitz 1985:598)所说的,联邦主义带来五种冲突解决机制:(1)给冲突热点降温;(2)将权力下放给不同的民族;(3)提供民族团结的激励;(4)在地方上助长民族内部矛盾,由此给横切分裂(cross-cutting cleavages)创造条件;(5)着力减少各族群间的差距。但显而易见,联邦主义并不是药到病除的,它有成功也有失败。

行政制度

在政府结构与合法性的关系方

面,有观点认为当其他条件相同时,总统权力强大的共和国不如某些代议制国家稳定,即由无实权的王室或选举产生的首脑治理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对于总统权力强大的共和国而言,行政首脑也是国家元首,象征性的权威和实权集于一身;而对于后者而言,这些权力分属不同的人。假如一位领导人独揽大权,公众就很难将他们对政权和对政策制定者的看法区分开来。在过去50多年里,许多拉丁美洲总统制国家在建设民主制度的过程中遭遇的困难就反映出这一点。美国的情况特殊,在这里尽管总统既掌握象征性的权威也掌握实权,但宪法在意识形态中具有神圣的地位,并已有有效运转200多年,因而拥有最高权威的是宪法本身,而非在位者。这种宪政上的(法理型)合法性经过很长时间才形成。美国在内战前有过许多次强大的分裂主义运动(例如1812年的新英格兰,1832年的南卡罗莱纳,还有1840年代主张废奴的人士反抗当时允许蓄奴的宪法)。而内战及之后的长期经济增长使美国的宪政取得了合法性。

胡安·林兹(Linz 1990a; 1990b)和弗雷德·里格斯(Riggs 1993)都更认可代议制度,认为在这种制度下行政权力是分散于内阁各个成员之间的,这些成员在立法机构中代表不同的群体和党派。相反,当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时,与总统不直接相关的人(即便是和总统同属一个党派)都会对这个政权及其政策缺乏忠诚。林兹还批评过总统制僵化的零和特质。他和里格斯都认为,总统制本身的问题是很多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

民主尝试多次失败的原因。

以上观点是值得商榷的(Lipset 1990a; Horowitz 1990)。如前所言,很多二战前在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东欧建立的代议制度都垮台了。在1958年,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曾将第三和第四法兰西共和国的脆弱归咎于多党代议制。这些共和国缔造了短命而低效的内阁。为了改变这样的状况,戴高乐采用了如下制度:一个强有力的总统同时与总理和立法机构分享权力。在法国,这些改革举措产生了更有效和长期的政府。在俄罗斯联邦(Russian Federation),叶利钦(Yeltsin)在1993年12月制定的新宪法也作出相似的尝试。

评估总统制和代议制还必须考虑两者的性质。在总统制政权中,立法权、通过预算和拨款的权力、对高层人士的任命权是由总统和(一般为两个)立法机构分享的;而代议制政权则是单一制的,总理和内阁掌握立法权。一个在议会中掌握多数席位的总理,正如大多数英联邦国家和一些欧洲国家的情况,比宪政体制下的总统更为强大而不受约束,因为宪政下的总统只能提出政策并交由国会审议(Lijphart 1984:4-20)。权力弱小而分化的宪政总统制在美国运转有效,尽管这种制度造成了不少挫败和疏离感。但是如前所述,这种制度在拉美不断受挫,尽管我们可以说这种现象的发生并非因为宪政制度本身,而是文化因素和较低的生产力导致的。很多代议制政权也因为无法选出在立法机构中占优的党派而导致政治不稳定。例如,在7个东欧前

共产主义国家里,只有阿尔巴尼亚选出了议会中的多数党。在波兰,1991年有29个党派在议会中赢得席位(*Economist* 1993a:5),不过在1993年大选后这一数字减少到7个。在叶利钦1993年12月的选举改革前,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里有14个党派,每个党派各有至少48名代表,另有199个无党派代表(*Economist* 1993b:59)。有12个党派在新的国家杜马中占有议席,另有120个独立代表。这些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否会发生变化仍是未知数。到目前为止,政治学者就总统制和代议制孰好孰坏并没有达成共识,因为两种体制都有过不少失败的例子。

选举制度

选择和更换行政当局的过程也会影响政权的合法性(Lipset 1979:293-306)。那些给予选民有效的方式来更换政府、以选票让当权者出局的选举制度能提供更高的稳定性;在那些选举法规、权力分配和党派力量的不同让做出改变更为困难的地方,选举的结果更易获得接受。

那些注重单一选区制(single-member districts)的选举制度,例如在美国和大多数英联邦国家,促使选民在两个主要党派之间作出选择。选民知道,如果对现政府感到不满,他们可以选择反对党。在这样的制度下,政治党派都是多元混杂的。由于反对派通常会承诺逆转当局的政策,很多选民都会“两害相权取其轻”(“*lesser evil*”),而执政党可能会因为施行的政策不受欢迎或碰巧在执政期间遭遇坏事而受到选票的惩罚。

在实行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的体制下,选民未必能够决定政府的构成。在比例代表制中,政党按照其得票比例获得席位。前希特勒时代的德国、前法西斯时代的意大利以及1920年代和1930年代初期的东欧大部分国家都实行过这种制度,它现在仍存在于以色列、意大利、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多数东欧国家和俄罗斯联邦。当没有哪个政党占据多数席位时,不同背景的党派可能互相结盟。一个联合政府内的政党可能得到选票,但也有可能在选举后被新内阁排除在外。小型的、善于捕捉机会或代表特殊利益的政党有可能掌握权力的平衡,并决定选举后产生的新的政治联盟的架构和政策。比例代表制易导致不稳定和缺乏选择,这些弊端可以通过设置最低票数的要求来缓解,例如德国和俄罗斯都规定至少要获得5%的选票才能得到席位。而无论是单一选区制还是比例代表制,都不能确保选举结果是哪些党派胜出(Lipset 1979:293-306; Gladdish 1993)。

公民社会和政党

作为政治基础的公民社会

强大的公民社会在促进稳定方面的作用比选举制更重要,即要有各种各样的“调解机制”(mediating institutions),包括在个人和国家之间独立运转的“社团、媒体和关系网”(Diamond 1993b:4)。它们构成“有能力反抗和制衡国家权力的亚组织”(Gellner 1991:500)。我在40年前首次尝试分析“有利于民主的

因素”(Lipset, Trow, and Coleman 1956:15)时就着眼于公民社会,我发现,“在一个庞大复杂的社会中,公民自身是没有能力去影响国家政策的。如果公民不属于任何政治团体,如果他们是分化的,那么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就会完全操控整个社会”(页15)。

公民团体必须成为制度化的政党的权力基础,也就是这些政党的支持者,这是现代民主的必要条件,也是其定义的一部分。正如彼得·默克尔(Merkel 1993)重申熊彼特(Schumpeter 1950)的论述:“政党一直以来都是促进民意的形成、产生有意义的选举结果和对政府作出影响的重要工具”(页257-58)。或这如维弗特(Weffort 1992)所言:“建设民主的过程是将冲突制度化的过程”(页111)。

我们现在对公民社会的重视是因为托克维尔(Tocqueville 1976)。他在19世纪初认为,当时的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上之所以比欧洲强大,是由于众多公民组织的存在。托克维尔说:

……(人们)参与这些组织一段时间就会意识到人数众多的组织是如何维持秩序,并且是通过怎样的聪明才智来和谐而有条不紊地向着共同目标前进的……因而政治组织可以被看作是大型免费学校,社群的成员们来这里学习结社的理论……(vol. 2:116)

通过他们的政治组织,不同条件、思想和年龄的美国人日常都在

7. 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安东尼奥·葛兰西在1920年代也指出,资本主义需要发展出“坚实的公民社会”,这会让通往民主之路变得可能(Stephens 1993:414),近几年利普塞特(Lipset 1981:52-53)和亨廷顿(Huntington 1984:202-3)也指出了这一点。

体会结社的滋味,并习惯去运用它.....参与者相互启发和影响彼此的行为。他们之后会把在结社中学到的理念应用到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vol. 2, 119)

一个运转完善的公民社会往往也是参与型的社会。在较大的政体中,各种组织会起到促进利益和行动的作用;它们能在那些对自身及其成员产生影响的项目上给政府提供建议,也能把相关信息反馈给民众。公民组织能够减少人民对意外改变的抵触,因为这些组织可以防止政府变成空中楼阁,并在利益出现分歧的早期就帮助缓和,或至少是帮助人们意识到这些分歧。

与熊彼特(Schumpeter 1950)所谓政党是民主基础的观点不同,一些民主价值观和权益主要是通过社会上各群体之间的博弈而发展的。各类不同阶层、宗教、经济、专业等方面的组织不一定谋求取得精英的政治权力,而是通过彼此之间以及与政府的竞争来获得民众的关注,并获取实践其政治设想的权力。如前所述,这些反对派要让自己的存在合法化,就必须鼓励别人的反对权,从而为民主提供基础。这些组织之间的冲突和意识形态的交锋造就了另一个政治空间,令社会不至于被政府操控。

而有效的公民社会在极权制度下是不存在的。相反,极权制度要么试图消灭在个人和国家之间斡旋的团体,要么就操控这些组织以便让自己没有竞争对手。尽管这样做可能减少“有组织的”反对派存在的可能,但同时也会削弱

公民社团的有效性,并减少个人学习创新活动的机会(例如托克维尔所说的“民事联盟”。Tocqueville [1976, vol. 2:124])。在西方,政体是建立在各种多元的组织上的,这些组织也是政党的基础(比如工会、民族和宗教组织、农民组织、退伍军人组织等等)。幸运的是,除了前共产主义国家之外,大多数新兴民主国家,例如阿根廷、智利、韩国、台湾和西班牙,在转型前都不是极权社会,也都在独裁时代就将公民社会中的一些多元机制制度化了(Scalapino 1989)。必须鼓励新兴民主国家更多建立这样的公民团体。不过,这些利益团体的“新领袖”大都是在“转型过程中才开始(支持民主)的”(Weffort 1992:12)。

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现在正面临缺乏现代公民社会的困境,这种缺失导致这些国家很难将民主政体制度化。一些国家通过教会建立了形成稳定的政治党派所必须的公民团体(比如波兰),还有一些国家通过各种小型的、自发的非法组织做到了这一点,但多数国家仍做不到(Sadowski 1993:171-80)。相反,它们不得不从无到有创建政党。意识形态松散的团体必须与前共产党对抗,而后者多年来组织严密并且建立了自己的联盟。现实情况是“分化而非联合:在波兰最近一次大选中,有67个政党参与角逐,在罗马尼亚有74个”(Economist 1993a:4)。其结果是,前共产党(现在的“社会主义政党”)被推选成为议会中的多数党,比如在立陶宛;或成为联合内阁中最大的政党,例如波兰的情况。在1992年1月,保加利亚一位由共产党支持的总统候选人拿

下了43%的选票(Malia 1992:73)。当然,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物质条件在变好前往先变坏,这种转型中的艰难也加剧了这种情况。

最近的调查还显示出共产主义统治45年到75年带来的其他一些持续效应。在几乎所有的东欧国家中,绝大多数人(约70%)认同“国家应该提供就业、医疗、住房、教育和其他服务”(Economist 1993a:5)。民主政制能否在这些国家获得成功主要取决于其公民能否适应自由、摒弃他们以往对国家角色的看法,以及能否接受市场经济起起伏伏的本质,当然,还有这些国家能否在经济上有出色的表现。蒂莫西·加顿·艾什(Garton Ash 1990)、伊拉兹姆·科哈克(Kohák 1992)和朱塞佩·狄·帕尔马(Di Palma 1991)都曾经对共产主义制度和思维模式的存续作出过令人信服的论述。匈牙利政治家和学者加斯帕尔·塔马什(Tamás 1992)也写道:

所有的民调都显示我们的公众反对独裁,但同时又希望有强人执政;拥护民选政府,但又痛恨议会、政党和媒体;喜欢社会福利立法和平等原则,但又排斥工会;希望推翻现有政府,但却不愿意看到长期的反对派存在;支持市场经济的概念(这是西方式生活标准的代名词),但又希望劫富济贫,并谴责银行在工薪阶层身上谋取暴利;支持制定最低工资标准,但又认为失业是一种道德上的五行并且希望惩罚甚至驱逐失业者(页73)。

作为调解者的政治党派

政党是公民和国家之间最重要的调解机制(Lipset 1993)。主流政党

的存在是一个稳定的民主社会的重要条件,它们拥有长期而广泛的群众支持。这种支持必须足够稳定,不会因明显的政策失误而丧失。如果没有这样的支持,一个政党就可能会被完全击溃,从而使有效的反对派不复存在。例如在1930年代,美国共和党执政时期开始大萧条,并造成前所未有的严重失业、破产和股市波动,但尽管共和党在选民中的支持率大幅下降,它依然是一个主流的反对党。

如果政党得不到这种程度的拥护,就像新兴民主国家的政党一样,它们就很容易落败。在美利坚合众国早期的历史中,由汉密尔顿带领的联邦党曾与由杰佛逊带领的民主共和党竞争政坛,而1800年联邦党人输掉总统大选后就迅速消亡了(Lipset 1979:40-41; Dauer 1953)。在后威权主义时代的欧洲国家,一些刚开始看起来享有广泛民众支持的民主运动——例如意大利的行动党(the Party of Action),在后佛朗哥时代西班牙的第一次选举中组成过多数政府的民主中间联盟(the Union of the Democratic Center),东德的公民联盟(the Civic Union),还有波兰的团结工会(Solidarity)——在之后的选举中都落败或支持率大幅下滑。如前所述,类似情况在一些前苏联国家也发生过。也许可以这样说,一个稳定的民主体制至少需要两个各自享有高度忠诚的选民支持的政党。民主需要强有力的政党参与、提供不同的政治纲领并互相批评。从历史上来说,在贫穷的印度,横切分裂与人们对种姓制度、语言和宗教团体的忠诚相关,这种横切分裂通过造

就广大民众对“政党的高度支持”而促进了民主的发展(Das Gupta 1989:95; Diamond 1989b:19)。而在最近,印度民主质量和稳定性的下滑也与党派制度的不稳和腐败有关(Kohli 1992)。

政治党派的支持来源

25年前,斯坦·罗坎(Stein Rokkan)和我尝试对欧洲政党多元的支持基础进行系统性的分析。在我们1967年的著作《政党制度和选民倾向》(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中,罗坎和我认为现代欧洲政治分野来源于两次革命,即民族革命(the National Revolution)和工业革命(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这些转型造成了社会分裂,从而影响政党的分野和选民的投票行为。民族革命是政治性的,并造成了中央和地方的冲突,即国家政府和文化与各种从属团体之间的冲突,比如那些往往存在于外围地区的民族、语言和宗教团体。这次政治革命也导致了国家和教会之间的冲突——国家试图控制教会,而教会则希望保持其一直以来作为一个团体的权利。工业革命则是经济革命,导致了农业和工业的矛盾,即地主和新兴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其后出现的是马克思着重分析的资本与劳工之间的矛盾。

这四种冲突(中央和地方、国家和教会、农业和工业、资本和劳工)在一定程度上延续到了今天,并给民主国家的政党制度提供了框架,特别是在欧洲。阶级成了最为显著的冲突和选举因素,尤其是在全体成年男性都拥有投票权以

后(Lipset and Rokkan 1967)。19世纪初的托克维尔(Tocqueville 1976:vol. 2, 89-93)和19世纪末的布莱斯(Bryce 1901:335)都注意到美国政党冲突的根本原因是贵族和民主利益诉求之间的矛盾。显然,上述四种冲突模式的党派表现在世界各地呈现出不同的样子(Lipset 1988:227-66, 1985:187-252)。有的表现为多党制或浓缩为两党联盟,例如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西方社会整体在20世纪上半叶的巨大变化,其政党制度的转变可以说是微不足道。实际上冲突已经变得系统化——1990年代的政党与二战前的情况类似。当中的主要变化在于法西斯运动的消失,以及某些国家在共产主义崩溃前夕,其代表劳工的政党分裂为两大主要政党。当然,这些劳工政党在二战后的政治舞台上变得比以往更为强大。在最近几十年,所有社会民主党和多数被大大削弱的共产党都改变了其意识形态倾向,不再拥护国有制,转而支持市场主导的经济模式(Lipset 1991)。

从196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世界似乎进入了一个新的政治时期,主要特征是“后物质主义议题”的升温,如“环境保护、核能的应用、更好的文化、女性和少数群体的平等、教育质量、国际关系、更广泛的民主化,以及更宽容的道德观,特别是关于家庭和性方面的道德观”(Lipset 1981:503-21)。一些社会分析家认为这些变化是即将发生的第三次“革命”,即后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并将导致新的社会和政治矛盾。罗纳德·英格尔哈特(Inglehart 1990)和其他学者曾经指出在这个时代里出现的

一种新的横切分裂:工业和环保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发生在那些信奉工业社会所重视的生产的人(这些人在社会议题上的观念也比较保守)和那些拥抱后工业时代价值观的人之间,后者认为应注重生活质量,在生态问题、女权主义和核能问题上持自由主义立场。对生活质量的关切很难成为政党的议题,但有一些组织,例如绿党(the Green parties)、新左派(the New Left)和新政治(New Politics)尝试推进这些议题,这些组织都是受过教育的中产群体。

稳定的政党-社会分野在后法西斯国家中再次出现,它也出现在最近从威权向民主转型的国家里,例如西班牙和智利。但如前所述,这种情况在大多数由前共产主义转变而来的“民主国家”都尚未出现,也许除了匈牙利之外。前共产党重新组织起来,成为“社会主义”政党。而那些非共产党则组成了各种不稳定的自由政党(自由放任主义)、民粹和民族主义政党、地方主义政党以及与宗教相关联的政党。它们缺少始终如一的意识形态,也缺少与固定的社会群体、特别是固定的社会阶层的联系。在俄罗斯,一个传统上政党分化的基础正在浮现,即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这是在西方社会最早出现的冲突。另一个是教会和国家(或教会和世俗)之间的矛盾,这种情况也在不同程度地显露。农业和工业(或农村和城市)之间的矛盾也较为明显。而讽刺的是,目前资本和劳工之间的矛盾是最不显著的,可能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一个独立组织起来的劳工阶级尚未形成。除非能形成稳定的政党,否则有竞争的民主

政治不大可能在东欧和中亚的新兴民主国家长存。不过,一些证据显示匈牙利和波兰的民主有巩固的趋势。

法治和经济秩序

最后,秩序和可预见性对于经济、政治和社会而言都很重要。在1867年,加拿大国父们为刚刚统一的国家起草了第一部宪法,他们将制宪的目标定为“和平、秩序和善政”(Lipset 1990b:xiii)。基本上来说,他们希望建设“法治”,建立“程序正义”和独立的司法机构。当权力专横、独裁并且难以预测时,公民就不知道该如何行事;民众会担心任何行为都可能导致无法预料的风险。从本质上而言,法治意为:(1)个人和组织受到法院、警察和行政机构等执法部门的公平对待;(2)个人和组织能较为准确地预知其行为在国家范畴内的后果。如世界银行(World Bank 1991)在一份报告中强调的:“法治是可预见性和稳定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让商业风险能得到理性的评估,让交易成本得以减少,让政府的任意性得以降低”(页iii)。这里我们再一次认识到政治和经济的共同需求。

在探讨“建立民主制度的社会先决条件”时,我多次强调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主政治的关系。如前所述,许多实证研究都已发现社会经济变量(例如国民生产总值、受教育水平、医保水平)和政治结果(例如自由和人权)存在重大关联(Lipset et al. 1993; Diamond 1992a; Inkeles 1991; Bollen and Jackman 1985a; Bollen and Jackman 1985b; Bollen 1979; 1980;

Flora 1973; Flanigan and Fogelman 1971; Olsen 1968; Neubauer 1967; Cutright 1963)。

最近几年一些向民主转型的国家可以作为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影响的例证(例如智利、西班牙、韩国和台湾)。在民主化之前,这些国家都在经济和人民福祉方面快速进步。但经济和人民福祉的关联是不稳定的(Lipset, et al. 1993)。比如,在印度这个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以及博茨瓦纳、巴布亚新几内亚、斯里兰卡等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福祉就不是正相关的。最近几年民主向一些欠发达国家扩散,也影响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福祉的相关性,不过这主要是因为两极世界的终结让第三世界国家的独裁者无法继续利用苏联和西方之间的矛盾获益(有关民主的扩散,参见Di Palma 1990:15–21)。

当然,社会经济方面的关联仅仅体现相关性,而不一定是因果性。其他变量,例如历史事件对本国政治的影响、文化因素、周边国家发生的事件、来自其他地方的扩散效应、领导力和社会运动都可能给一国政体带来影响。因此,受到其他欧洲国家影响的西班牙内战的结果将西班牙置于威权主义的体系中。同样的,二战后东欧被置于苏联的控制下,这决定了东欧的政治前景,也决定了西方国家会努力阻止亲共势力在选举中获胜。目前看来,国际机构和外国政府更有可能支持多元主义的政权。

泰利·莱恩·卡尔和费利佩·施密特(Karl and Schmitter 1991:270–

71)认为,为民主寻找先决条件是错误的。他们通过观察政权和政党的缔约过程(pact-making process)来阐述民主转型。卡尔认为,“与其徒劳无功地研究民主的先决条件,更重要的是搞清楚政权转型的模式(这些模式是由威权主义政权的崩溃而决定的)如何为战略互动(strategic interactions)定下了基调,因为这些互动帮助决定了政治民主是否能够诞生和生存……”(Karl 1990:19)。

卡尔和施密特(1991)认为对精英缔结政治条约的行为的研究和对民主先决条件的研究只能二选一。我并不同意这种观点。对社会先决条件的分析所关注的是成功巩固民主的基础。由于精英缔约是将民主制度化的一种方式,缔约情况是否出现、能否长存都与这些先决条件是否存在有关。正如维弗特(Weffort 1992)强调的,“一个民主体制的最低运行标准显示出其最基本的社会条件”(页18)。因此,我们并不需要在研究民主的先决条件和缔约过程方面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结论

民主是一项国际性的事业。许多民主政府和政党,以及各种致力于保护人权的非政府组织(NGOs)都在出钱出力,在自由转型中的国家创造和维持民主力量,并给独裁国家施压、促使其作出改变(Economist 1993c:46)。各类的国际机构和组织,例如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y)、北约(NATO)、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都把民主制度作为入会或者提供资助款项的先决条件。许多研究均指出,民主的扩散效应(diffusion)、感染效应(contagion)或示范效应(demonstration)都具有可行性,都能促进民主国家争取改革,并让威权统治者作出让步。回避自由选举已变得既不入流又无利可图,特别是在拉丁美洲、东亚、东欧,在一定程度上非洲也是如此(Ake 1991:33)。不过,一个国家宣布会举行选举,不代表选举就一定公正。外界可以给予帮助;但制度化的反对力量以及利益和价值的表达,这些事物的基础必须由内而来。

研究结果显示一些新兴民主国家的合法性较低,因此我们必须对其能否长治久安保持谨慎态度。巴西学者维弗特(Weffort 1992)曾提醒我们,“1980年代是新兴民主的时代,当时一些国家政治民主化的过程是与深刻而长久的经济危机同时发生的,这种经济危机导致了社会排斥和大规模的贫困……其中一些国家将政治民主建立在社会分裂的雷区之上……”(页20)。这样的情况很容易导致民主的崩溃,就像在阿尔及利亚、海地、尼日利亚和秘鲁等国已经发生的一样;也可能导致民主功能的退化,比如在巴西、埃及、肯尼亚、菲律宾、前南斯拉夫和一些乌拉尔地区的共和国;还可能导致左翼和右翼反民主运动的复兴,例如在俄罗斯和其他前共产主义国家。

新兴民主国家要取得合法性最重要的是要做到有效(efficacy),尤其是经济领域,也包括政治领

域。如果这些国家能在经济发展上有所作为,那么也应能够保持政治上的秩序。但正如我试图证明的,经济增长带来的压力也可能影响民主的稳定。拉里·戴蒙德(Diamond 1992b)在其关于非洲的研究中提出的问题也适用于许多前共产主义国家:“如何才能调和民主与带来短期痛苦的(经济)结构变革之间的矛盾?”(页41)。有一些人认为戈尔巴乔夫式的经济和社会改革(perestroika)必须先于政治开放(glasnost)。他们认为在贫穷的国家,先推动经济和社会改革更为可行。

在结尾前,我想谈一谈方法论的问题。本文的一部分旨在从民主转型中的国家的经验和结构特征的角度找出民主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及其对社会分化的影响。但也正如我所说,在这之中也有很多其他的存在。由于有众多可能的因果关系,任何变量或政策都不可避免地可能带来相反的结果。亨廷顿(Huntington 1991:37–38)指出,在有关民主化的研究中有27个独立的解释变量。我们可以将其与医学领域进行恰当的类比:在医学中,基于成千上万个案例得出的概率也无法告诉医生究竟应该如何治疗某一个具体的病人。同样的,即使是我们提出的最为直观的概述,即有关经济发展的好处的概述,也不一定应用于一个具体的国家。我们知道,发展可能打乱人们的生活模式和社会关系,改变人们的期待值,并使得人们容易受到极端主义运动的感召。如前所述,托克维尔(Tocqueville 1976)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已经预示到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动荡中的经历;托克维尔认为,一

个政治制度可能恰恰会在条件开始好转的时候崩溃,是人们期望值的提高和传统价值观与信念的减弱压垮了它(vol. 1, 6-13)。

自二战以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汗牛充栋的实证性、历史性和比较性研究大大加深了我们对民主的条件理解。现在我们可以较为自信地进一步提出一些论断,探讨有关对民主有利的结构性、文化性和制度性因素。但是具体结果的产生还有赖于具体的环境:取决于一国既有的选举和其他政治制度是否适合其民族和分化的架构、该国经济发展的状况,当然,还有其中主要参与者的能力和策略。例如,华盛顿、林肯、列宁、戈尔巴乔夫、尼赫鲁和戴高乐,他们都对其所处的时代和国家的民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因此,我们显然不能将研究结论生搬硬套。我在本文中探讨过的各种因素确实会对民主的可能性产生影响,但它们不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社会科学家并不擅长预测未来。达尔(Dahl 1971:208)和亨廷顿(Huntington 1984)这两位着眼于结构性条件的学界先驱,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前都对多头政治(polyarchies)或民主制度的发展感到悲观。这与多数苏联学家没能成功预测苏联解体是相似的(参见Lipset和Bence即将发表的研究)。民主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政治领袖和群体的选择、行为和决定。

作者简介:西摩·马丁·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是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和社会学教授。他在公共政策领域的研究受到弗吉尼亚·E·哈泽尔和小约翰·T·哈泽尔基金的支持。利普塞特是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坦福大学荣休教授。利普塞特教授是美国文理科学院成员。他曾担任美国社会学会和美国政治学会主席。他的著作《政治人》(Political Man)获得了麦基弗奖(MacIver Award);与厄尔·拉布(Earl Raab)合著的《非理性政治》(The Politics of Unreason)获得了贡纳尔·默达尔奖(Gunnar Myrdal Award)。利普塞特还有两本书即将出版:一本是关于美国例外主义的研究,另一本是与厄尔·拉布合著的有关美国犹太社群的研究。利普塞特正与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和胡安·林兹(Juan Linz)合作进行民主转型方面的研究。

参考文献

- Ake, Claude. 1991. "Rethinking African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2(1):32-47.
- Ackerman, Bruce. 1992. *The Future of Liberal Revolu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 Almond, Gabriel. 1956. "Comparative Political Systems." Pp. 34-42 in *Political Behavior: A Reader in Theory and Research*, edited by H. Eulau, S. J. Eldersveld, and M. Janowitz. Glencoe, IL: Free Press.
- Almond, Gabriel and Sidney Verba. 1963.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 Amalrik, Andre. 1970. *Will the Soviet Union Survive Until 1984?*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Berger, Peter. 1986. *The Capitalist Revolu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2. "The Uncertain Triumph of Democratic Capital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3(3):7-17.
- Bobbio, Norberto. 1987. *The Future of Democracy: A Defense of the Rules of the Game*.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 Bollen, Kenneth. 1979. "Political Democracy and the Timing of Develop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4:5 72-8 7.
- . 1980. "Issues in the Comparative Measurement of Political Democrac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5:370-90.
- Bollen, Kenneth and Robert Jackman. 1985a. "Economic and Non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Political Democracy in the 1960s." *Research in Political Sociology* 1:27-48.
- Bollen, Kenneth and Robert Jackman. 1985b. "Political Democracy and 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0:438-57.
- Bryce, James. 190 I. *Study in History and Jurisprude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 Calhoun, John. 1947. *A Disquisition on Government*. New York: Political Science Classics.
- Chan, Steve. 1989. "Income Inequality Among LDC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3:45-65.
- Cutright, Phillips. 1963. "National Political Development: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8:253-64.
- Dahl, Robert. 1970. *After the Revolution: Authority in a Good Societ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 . 1971.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 . 1982. *Dilemmas of Pluralist Democrac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 Das Gupta, Jyotirindra. 1989. "India: Democratic Becoming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Pp. 53-104 in *Dem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sia*, edited by L. Diamond, J. Linz, and S.M. Lipset.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 Dauer, Manning. 1953. *The Adams Federalists*.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 Diamond, Larry. 1989a. "Beyond Authoritarianism and Totalitarianism: Strategies for Democratization."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1):141-63.
- . 1989b. "Introduction: Persistence, Erosion, Breakdown and Renewal." Pp. 1-52 in *Dem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sia*, edited by L. Diamond, J. Linz, and S. M. Lipset.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 . 1992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Reconsidered." Pp. 93-139 in *Reexamining Democracy: Essays in Honor of Seymour Martin Lipset*, edited by G. Marks and L. Diamond. Newbury Park, CA: Sage.
- . 1992b. "The Second Liberation." *Africa Report* 37:38-41.
- . 1993a.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and Democracy." The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CA. Unpublished manuscript.
- . 1993b. "Ex-Africa, a New Democratic Spirit Has Loosened the Grip of African Dictatorial Rul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2 July (no.4709), pp. 3-4.
- Diamond, Larry, Juan Linz, and Seymour Martin Lipset, eds. 1988. *Dem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frica*.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 Diamond, Larry, Juan Linz, and Seymour Martin Lipset, eds. 1990. *Politic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omparing Experiences with Democracy*.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 Di Palma, Giuseppe. 1990. *To Craft Democracies. An Essay on Democratic Transition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 1991. "Legitimation from the Top to Civil Society: Politico-Cultural Change in Eastern Europe." *World Politics* 44(1):49-80.
- Dogan, Mattei, ed. 1988. *Comparing Pluralist Democracies: Strains on Legitimacy*. Boulder, CO: Westview.
- Economist*. 1993a. Survey on Eastern Europe. March 13: 1-22.
- Economist*. 1993b. "Russia Into the Swamp." May 22:59-60.
- Economist*. 1993c. "Aid for Africa: If You're Good." May 29:46.
- Eisenstadt, Shmuel N. 1968. "The Protestant Ethic Theses in the Framework of Sociological Theory and Weber's Work." Pp. 3-45 in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Modernization: A Comparative View*, edited by S. N. Eisenstadt. New York: Basic Books.
- Feshbach, Murray. 1978. "Population and Manpower Trends in The U.S.S.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the Soviet Union Today, sponsored by the Kenna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Russian Studies,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Apr., Washington, DC.
- . 1982. "Issues in Soviet Health Problems." Pp. 203-27 in *Soviet Economy in the 1980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Part 2. U.S. Con-

- gress,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97th Cong., 2d sess., 31 Dec.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 1983. "Soviet Population, Labor Force and Health." Pp. 91-138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oviet Union*. U.S. Congress, Joint Hearings of the 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and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98th Cong., 1st sess., 26 July and 29 Sept.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Flanigan, William H. and Edwin Fogelman. 1971. "Pattern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Democratization: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Pp. 441-74 in *Macro-Quantitative Analysis: Conflic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tization*, edited by J. Gillespie and B. Nesvold. Beverly Hills, CA: Sage.
- Flora, Peter. 1973. "Historical Processes of Social Mobilization: Urbanization and Literacy: 1850-1965." Pp. 213-59 in *Building States and Nations: Models and Data Resources*, vol. I, edited by Shmuel N. Eisenstadt and S. Rokkan. Beverly Hills, CA: Sage.
- Freedom Review. 1993. "Freedom Around the World." Freedom Review. 24(1)(Special Issue):3-67.
- Garton Ash, Timothy. 1990. "Eastern Europe: The Year of Truth."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5 Feb., pp. 17-22.
- Gellner, Ernest. 1991. "Civil Society in Historical Context."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43:495-510.
- Gibson, James L. and Raymond M. Duch. 1993. "Emerging Democratic Values in Soviet Political Culture." Pp. 69-94 in *Public Opinion and Regime Change*, edited by A. A. Miller, W. M. Reisinger, and V. Hesli. Boulder, CO: Westview.
- Gladlish, Ken. 1993. "The Primacy of the Particular." *Journal of Democracy* 4(1):53-65.
- Glassman, Ronald. 1991. *China in Transition: Communism,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Westport, CT: Praeger.
- Gorbachev, Mikhail. 1987. Text of Report delivered to plenary meeting of CPSU Central Committee.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Daily Report: Soviet Union*, 28 Jan., pp. R2-R48.
- . 1988. Text of Report delivered to CPSU Central Committee at 19th All-Union CPSU Conference.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Daily Report: Soviet Union*, 28 June (Supp.), pp. 1-35.
- Guinier, Lani. 1993. "Groups, Representation, and Race-Conscious Districting: A Case of the Emperor's Clothes." *Texas Law Review* 71:1589-642.
- Guroff, Gregory and A. Guroff. 1993. "The Paradox of Russian National Identity." (Russian Littoral Project, Working Paper No. 16). College Park and Baltimore, MD: University of Maryland-College Park an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AIS.
- He Baogang. 1992. "Democratization: Anti-democratic and Democratic Elements in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China."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7: 120-36.
- Horowitz, Donald. 1985.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 1990. "Comparing Democratic Systems." *Journal of Democracy* 1(4):73-79.
- Huntington, Samuel. 1968.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 . 1984. "Will More Countries Become Democratic?"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99:193-218.
- . 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OK: University of Oklahoma.
- . 1993.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72(3):22-49.
- Inglehart, Ronald. 1990. *Culture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 Inkeles, Alex, ed. 1991. *On Measuring Democracy: Its Consequences and Concomitants*.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 Johnston, Michael. 1991. "Historical Conflict and the Rise of Standards." *Journal of Democracy* 2(4):48-60.
- Karatnycky, Adrian. 1994. "Freedom in Retreat." *Freedom Review* 25(1):4-9
- Karl, Terry Lynn. 1990. "Dilemmas of Democrat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Comparative Politics* 23:1-21.
- Karl, Terry Lynn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 1991. "Modes of Transition in Latin America: Southern and Eastern Europe."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43:269-84.
- Kazancigil, Ali. 1991. "Democracy in Muslim Lands: Turke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43:343-60.
- Kennan, George. 1977. *Clouds of Danger: Current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oston, MA: Little, Brown.
- Klitgaard, Robert. 1991. "Strategies for Reform." *Journal of Democracy* 2(4):86-100.
- Kobak, Erazim. 1992. "Ashes. Ashes ... Central Europe After Forty Years." *Daedalus* 21(2):197-215.
- Kohli, Atul. 1992. "Indian Democracy: Stress and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3(1):52-64.
- Kuznets, Simon. 1955.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5:1-28.
- . 1963. "Quantitative Aspects of the Economic Growth of Nations: VIII,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by Siz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1: 1-80
- . 1976. *Modern Economic Growth: Rate, Structure and Spread*.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 Lee, Stephen J. 1987. *The European Dictatorships*. 1918-1945. London: Methuen.
- Lewis, Bernard. 1993. "Islam and Liberal Democracy." *Atlantic Monthly*. 271(2):89-98.
- Lijphart, Arend. 1977. *Democracy in Plural Societies: A Comparative Explora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 . 1984. *Democracies, Patterns of Majoritarian and Consensus Government in Twenty-One Countrie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 Linz, Juan J. 1978. *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egimes: Crisis, Breakdown, and Re-equilibrium*.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 . 1988. "Legitimacy of Democracy and the Socioeconomic System." Pp. 65-97 in *Comparing Pluralist Democracies: Strains on Legitimacy*, edited by M. Dogan. Boulder, CO: Westview.
- . 1990a. "The Virtues of Parliamentar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1(4):84-91.
- . 1990b. "The Perils of Presidential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1(2):51-69.
- Linz, Juan J. and Alfred Stepan, eds. 1978. *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egimes*.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 . 1989. "Political Crafting of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or Destruction: European and South American Comparisons." Pp. 41-61 in *Democracy in the Americas: Stopping the Pendulum*, edited by R. A. Pastor. New York: Holmes and Meier.
- Lipset, Seymour Martin [1960] 1981.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Expanded ed.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 . [1963]1979. *The First New Nation*. Expanded ed. New York: Norton.
- . [1970]1988.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Change and Persistence in Social Structures*. Revised ed.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 . 1985. *Consensus and Conflict: Essays in Political Sociology*.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 . 1990a. "The Centrality of Political Culture." *Journal of Democracy* 1(4):80-83.
- . 1990b. *Continental Divide: The Values and Institu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New York: Routledge.
- . 1991. "No Third Way: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the Left." Pp. 183-232 in *The Crisis of Leninism and the Decline of the Left: The Revolutions of 1989*, edited by D. Chirot.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 . 1992. "Conditions of the Democratic Order and Social Change: A Comparative Discussion." Pp. 1-14 in *Studies in Human Society: Democracy and Modernity*, edited by S. N. Eisenstadt. New York: E. J. Brill.
- . 1993. "Reflections on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4(2):43-53.
- Lipset, Seymour Martin and Gyorgy Bence. Forthcoming. "Anticipations of the Failure of Communism." *Politics and Society*.
- Lipset, Seymour Martin and Stein Rokkan. 1967. "Cleavage Structures,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Pp. 1-64 in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edited by S. M. Lipset and S. Rokkan. New York: Free Press.
- Lipset, Seymour Martin, Kyoung-Ryung Seong and John Charles Torres. 1993.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45: 155-75.
- Lipset, Seymour Martin, Martin Trow and James Coleman. 1956. *Union Democracy: The Inside Politics of the International Typographical Union*. New York: Free Press.
- Macdonald, Donald S. 1992. "Korea's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Pp. 19-28 in *Democracy in Korea: The Roh Tae Woo Years* (papers published from the June 22, 1992 Merrill House conference), edited by C. Sigur. New York: Carnegie Council on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 Malia, Martin. 1992. "Leninist Endgame." *Daedalus* 121(2):57-75.
- Mann, Michael. 1993. "The Struggle Between Authoritarian Rightism and Democracy: 1920-1975" (Working Paper 1993/45). Juan March Institute,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Social Sciences, Madrid, Spain.
- Marx, Karl. 1958. *Capital*. Vol. I. Moscow, Russia: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 Merkel, Peter H. 1993. "Which Are Today's Democracies?"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45:257-70.
- Moore, Barrington. 1966.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MA: Beacon.
- Muller, Edward N. 1988.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3:50-68.
- Nathan, Andrew J. and Tao Shi. 1993. "Cultural Requisites for Democracy in China: Findings from a Survey." *Daedalus* 122:95-124.
- Neubauer, Deane. 1967. "Some Conditions of Democr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1:1002-9.
- Olsen, Marvin E. 1968.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National Political Develop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3:699-712.
- Olson, Mancur, Jr. 1963. "Rapid Growth as a Destabilizing Forc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3:453-72.
- Pye, Lucian W. 1965. "Introduction: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p. 3-26 in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edited by L. Pye and S. Verb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 . 1968.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Cambridge, MA: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Pye, Lucian with Mary W. Pye. 1985. *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 Riggs, Fred. 1993. "Fragility of the Third World's Regimes."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45:199-244.
- Rueschemeyer, Dietrich, Evelyne Huber Stephens, and John D. Stephens. 1992.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 Rustow, Dankwart. 1970.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Comparative Politics*. 2:337-66.
- Sadowski, Christine M. 1993. "Autonomous Groups as Agents of Democratic Change in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Eastern Europe." Pp. 163-95 in *Political Culture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edited by L. Diamond.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 Sartori, Giovanni, ed. 1983. *Social Science Concepts: A Systemic Analysis*. Beverly Hills, CA: Sage.
- . 1987. *The Theory of Democracy Revisited*. Chatham, NJ: Chatham House.
- Scalapino, Robert H. 1989. *The Politics of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on Twentieth Century Asi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 Schmitter, Philippe C. and Terry Lynn Karl. 1993. "What Democracy Is ... and Is Not." Pp. 39-52 in *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Democracy*, edited by L. Diamond and M. F. Plattner.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 Schneidman, Witney W. 1992. "Africa's Transition to Pluralism: Economic and Investment Implications." *CSIS Africa Notes* (Nov.):1-7.
- Schumpeter, Joseph. 1950.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3d ed.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Seung-Soo, H. 1992. "Democra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Economic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p. 79-90 in *Democracy in Korea: The Roh Tae Woo Years* (papers from the June 22, 1992 Merrill House conference), edited by C. Sigur. New York: Carnegie Council on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 Sklar, Richard. 1987. "Developmental Democrac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9:686-714.
- Skocpol, Theda. 1979.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 Smith, Tony. 1978.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rench and British Decolonization."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0(1):70-102.
- Spencer, Metta. 1991. "Politics Beyond Turf: Grassroots Democracy in the Helsinki Process." *Bulletin of Peace Proposals* 22(4):427-35.
- Stephens, John D. 1993.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Social Origins of Democracy." Pp. 409-47 in *The Idea of Democracy*, edited by D. Copp, J. Hampton, and J. Roemer.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 Therborn, Goran. 1977. "The Rule of Capital and the Rise of Democracy." *New Left Review* 103:3-41.
- Tamas, Gaspar M. 1992. "Socialism, Capitalism, and Modernity." *Journal of Democracy* 3:60-74.
- Tocqueville, Alexis de. 1976. *Democracy in America*. Vols. I and 2. New York: Knopf.
- Todaro, Michael P. 1981.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Longman.
- Todd, Emanuel. 1979. *The Final Fall: Essays on the Decomposition of the Soviet Sphere*. New York: Karz.
- Trudeau, Pierre. 1960. "Some Obstacles to Democracy in Quebec." Pp. 241-59 in *Canadian Dualism*, edited by M. Wade. Toronto, Ontario, Canada: University of Toronto.
- Tu, Wei-ming. 1993. "Introduction: Cultural Perspectives." *Daedalus* 122:vii-xxii.
- Vatikiotis, Panayiotis J. 1988. *Islam and the State*. London, England: Croom Helm.

